

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趋势研究 ——基于 CMDS2012-2018 数据的分析^①

罗红霞 朱星羽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基于 CMDS 2012-2018 和年鉴数据, 本文采用 Arcgis 可视化和 Stata 回归分析可知: 空间分布上, 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走低, 与内地呈“剪刀差”趋势, 局地分为“虚空化型”“稳定型”“波动型”和“聚集型”; 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县域居留意愿更高。人群分型上, 边境县域多吸引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流动范围上, 迁入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 迁出以向东部跨省为主。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上, 个人社会特征作用方向不一致, 呈“乡迁城”“低文化”和“家庭型”, 但经济与社会融合变量作用相对稳定。其政策寓意在于: “经济人”“社会人”属性共同作用于该群体的居留意愿, “逆虚空化”政策调适需推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

[关键词] 西南边境; 县域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 影响因素; 历时变化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22)06-0024-13

1. 问题的提出

西南边境地区是我国西南国防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 是开放交流的前沿。其人口流动迁移事关边防巩固、民族团结和开放发展。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缅皎漂港项目建设等, 西南边境重要性越发凸显, 其稳定和发展都迫切需要大量人力资源, 但却出现了常住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空巢化^①和“少子化”^②现象。边境能否吸引流动人口居留将成为“逆空心化”的突破口,

①[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西南边境居民居留稳定性及其优化机制研究”(20BZZ024);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主题案例项目“从行政嵌构到共同生产: 边疆乡村振兴的西南实践——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案例观察”(ZT-211067303), 云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网络问政下昆明市政府回应公共诉求的效果及城区差异研究”(2022Y10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22-06-16

[作者简介] 罗红霞,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政府绩效、人口流动研究。朱星羽,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城乡基层治理、人口流动研究。

②注: 部分边境市 2015 与 2020 年的出生率: 保山市 (12.90‰、11.59‰)、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12.42‰、14.51‰)、临沧市 (12.96‰、11.1‰)、普洱市 (12.20‰、12.58‰)、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11.75‰、12.49‰)、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3.24‰、11.27‰)、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12.90‰、11.59‰), 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

因此其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应当成为边疆治理政策的重要考量。

目前,西南边境流动人口以流出为主,敲响“留不住”的预警,亟待理论详析以精准资政。三次人口普查(1990年、2000年、2010年)中西南边境流动人口数量总体持续增长,由外来人口为主转向外出人口为主,外来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2]。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西南边境地区33个边境县(市)流出人口123.19万人,流入人口108.66万人,流出人口规模明显高于流入人口^[2]。边境流动人口“留不住”的严峻结论使得探究其规律和对策更显迫切。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是指流入人口在迁入地居住生活一定时间后,综合考量个体与家庭特征、结合流入流出地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做出的决策。因此其不仅会影响流动人口个体或家庭在各地间的各种生活安排与规划^[3],而且对各地的城镇化发展与流动人口市民化都具有重要影响^[4],是产业合理布局、资源优化配置和福利平衡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还影响着边境地区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的构建。但现有研究存在“注意力瓶颈”,侧重研究某一边境县或更小范围的区域在特定年份的人口留迁情况,而对边境片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历时性变化趋势研究不足。

为此,文章从纵向时间维度,利用国家卫健委执行多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选取2012—2018年西南边境境内^[5-6]的多轮截面调查数据,再结合同期云南、广西统计年鉴,对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进行分析,探究其政策寓意。

2. 文献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逐渐成为重要课题。近年来研究多关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测度、影响因素及其变化等^[7],对于西南边境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注还有待提高,这也是国家边境安全观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进程的需要。

2.1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趋势研究

大部分学者多关注单一年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少量学者从纵向时间维度对其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1998—2018年左右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增长快,但其后发展趋势趋于平稳^[7-9],并未因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工作的推进,以及人口流动家庭化、滞留长期化等人口流动模式变动而发生重大变化^[10]。二是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近十余年来持续上升^[7],当测评选项在“定居”“返乡”之间增加了“循环流动”^[7]后,前两者比例均有所下降,犹豫不决比例上升^[9],逐渐呈现出复杂的三维分化现象,但选择定居意愿依然是主流^[11]。

2.2 边境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关于边境人口居留意愿(或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在推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12]等框架下考察。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受到了来自于流出地不利环境与个人社会因素的推力和流入地优越条件的拉力^[13],其合力决定人口流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将流动人口个体及其家庭的特征、人力资本投资、家庭资源配置策略和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波动等方面因素纳入研究视野。

现有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等。务工经商是云南^[14]和东北边境县人口流入最主要的原因^[15],其居留意愿受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入时间和流动模式的

显著影响,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险、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特征、城市因素、迁移距离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16-17]。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婚姻状况、外出经历,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影响并不显著^[18]。云南边民(常住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受到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道路交通、就业机会、发展前景和安全感知7个因素的显著影响^[19]。促进新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积极要素主要包括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状况、本地居留时长等^[20]。

综上,研究边境人口的学者们给出了影响居留意愿的数十个因素,但基于不同地区、不同时点的数据得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却不尽相同,不能实现“三角互证”。而且大部分研究未针对某区域进行较长时段的整体观察,也未涉及跨群体跨年度的比较。因此,文章采用近十年的数据,分析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水平在不同时段的总体空间、局部空间以及群体间的分布变化,进行分型与比较,寻找变化规律。其次,判定影响其居留意愿的因素及其历年间的一致性、稳定性。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1 研究区域

中国内陆边界线大体可分为三段,即东北部边界线段、西北部边界线段和西南部边界线段^[5],其中西南边境包括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的边境沿线^[21],但西藏有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地理环境恶劣、地广人稀、流动人口少,因此仅研究其余两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的边境县(市),包括云南省24个、广西壮族自治区5个,共29个边境县(市),详见表1。

3.1.2 数据来源和变量设置

本文采用CMDS 2012-2018数据^③,其采取分层分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聚类抽样,将在流入地居住超过一个月以上,非本地区(县、市)户籍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作为调查

表1 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西南边境采样地区

	地级市	边境县(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	防城区、东兴市
	崇左市	凭祥市、龙州县
	百色市	靖西市
云南省	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临沧市	镇康县、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保山市	龙陵县、腾冲市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栗坡县、马关县、富宁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绿春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瑞丽市、盈江市、芒市、陇川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福贡县

③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简称CMDS)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自2009年起一年一度的在流入地进行的截面调查,它涵盖了中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新发布到2018年,2010年、2011年、2013年的数据中没有关于居留意愿的问题。部分边境县仅某一年或某两个年份有数据,2012年流动人口有效样本量为975个,2014年为960个,2015年为1239个,2016年为1076个,2017年为1920个,2018年为840个,共计7010个样本。

对象。文章在去除无效个案后,选取居住在云南、广西 29 个边境县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共计 7010 个,并结合同期两省区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分析。因变量为长期居留意愿(愿意在本地居留 5 年及以上)^④,愿意赋值为 1,不

表 2 主要变量的定义描述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居留意愿	不愿意 =0, 愿意 =1
	性别	男 =0, 女 =1
控制变量	年龄	15 - 25 岁 =0, 26 - 35 岁 =1, 36 - 45 岁 =2, 46 - 55 岁 =3, 55 岁以上 =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0, 初中 =1, 高中及中专 =2, 大专及以上 =3
	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口 =0, 农业户口 =1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	有 =1, 无 =0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0, 省内跨市 =1, 市内跨县 =2
流动特征	流入时间	1 年以下 =0, 1 - 3 年 =1, 4 - 6 年 =2, 7 - 9 年 =3, 10 年及以上 =4
	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3000 以下 =0, 3001-6000=1, 6001-9000=2, 9001 以上 =3
核心解释变量 - 经济融合	住房性质	租房 =0, 自有住房 =1, 低租金或免费住房 =2
	主要职业	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 农业及产业工人 =2, 其他 =3
核心解释变量 - 社会融合	就业身份	雇员 =0, 雇主 =1, 自营者 =2
	热爱流入地	
	关注流入地	
	愿意主动融入	否 =0, 是 =1
	本地人接纳	
	身份认同	

愿意与没想好则赋值为 0。自变量包括个人社会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融合、社会融合 4 个层次。其中,个人社会特征与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前者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户口性质 5 个指标,后者包括流入本地的时间与流动范围。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是核心解释变量,经济融合包括家庭平均月收入、主要职业和就业身份^[22-23]这 3 个变量。社会融合包括流入人口的社会心理认同,比如身份认同与文化适应等,参见表 2^⑤。

3.1.3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Arcgis 10.8 对西南边境县域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再用 Stata16.0 软件进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为:

④大量文献将 CMDs 中被调查者是否“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五年以上)”作为判断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指标,这也是本文的判断指标。2012-2016 年为“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 年及以上)?”2017 年的问卷中,提问方式修改为“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选项则按照 1—2 年、3—5 年、6—10 年、10 年以上、定居和没想好共 6 个选项。2018 年提问方式与 2017 年相同,但选项改为:0-4 年、5-9 年、10 年以上、定居。为使 2017 年、2018 年的结果与以往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文将 5 年以上与定居等的选项合并为“愿意”并赋值为 1,将“不愿意”及“没想好”合并成“不愿意”赋值为 0。

⑤社会融合对于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析具有重要作用,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仅 2012 年与 2017 年有与社会融合相关的问题,因此本文仅选取了 2012 年与 2017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 2012 年与 2017 年调查中“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或地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与老家相比,你现在感觉是否幸福(2012)”“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2017)”五个问题的认同度划分为是与否(1, 0)。

$$\text{logit}(\text{Willingness}) = \ln\left(\frac{\text{Willingness}}{1 - \text{Willingness}}\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n X_n$$

$$\text{Willingness} = \frac{1}{1 + e^{-(\beta_0 + \beta_1 X)}}$$

式中: Willingness 是西南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概率; β_0 是截距; β_i 估计数值大小对该因素的影响作用大小, 正负值表示该因素所起到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X 是方案选择属性的值。 $\frac{\text{Willingness}}{1 - \text{Willingness}}$ 是概率比, 反映流动人口愿意与不愿意在西南边境地区长期居留的比值, 在给定参照条件情况下如果几率比 >1 , 那么分类变量的群体长期居留意愿相对较强。

3.2 近十年西南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时空分布特点

西南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时空分布^⑥是指在不同时间维度上, 居留意愿在西南边境不同县域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相互作用后形成的分布格局。其具有 4 方面的特点:

3.2.1 西南边境与内地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剪刀差”趋势

所谓“剪刀差”现象, 原指某些经济指标随着时间推移而拉大差距的现象, 比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城乡收入水平、城乡福利等差距日益扩大, 呈剪刀张开形态^[24]。这里借指边境与内地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距逐渐增大的现象。由图 1 可知, 2012—2018 年西南边境县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整体呈下降趋势 (除 2017 年外), 从 66.33% 下降至 46.57%, 而全国县 (区) 则缓慢增长, 从 56.17% 升至 57.22%, 二者差距越来越大。结合图 2、图 3 的 GDP 平均增速可知^⑦, 西南边境这一时期人均 GDP 平均增速为 6.59%, 比全国数据 6.68% 低了 0.09%。经济梯度下人口的逐利流动会导致该“剪刀差”继续扩大, 如果不加以适当干预, “空心化”情况将加剧。根据陆铭《大国大城》中“在集聚中走向均衡”的观点, 这一干预不能是简单的两极化政策思维——“将人口固着于边境”“将资源倾注于边境”, 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前者不利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核心理念, 后者将导致资源利用率低。需要对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 再精准拟策施策。

3.2.2 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走低而局地可分 4 种类型

通过 Arcgis 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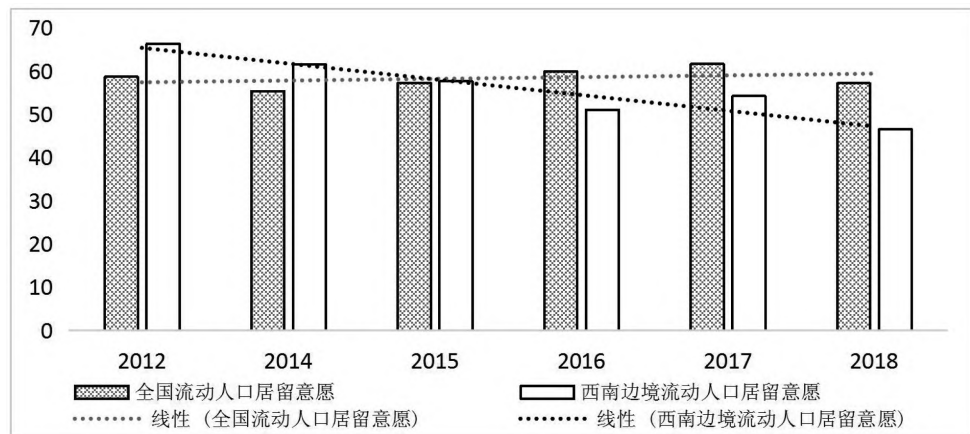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18 年居留意愿占比 (%)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健委 CMDs 2012—2018)

⑥本文采用的时空分布是静态意义上的时空分布。

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云南、广西的《城市统计年鉴》, 仅测算了具有居留意愿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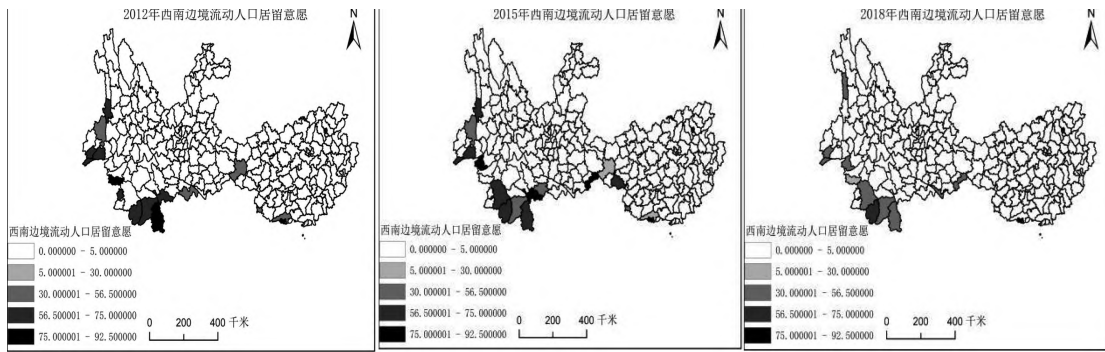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18 年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变化情况

(注: 图 2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 2012 年、2015 年、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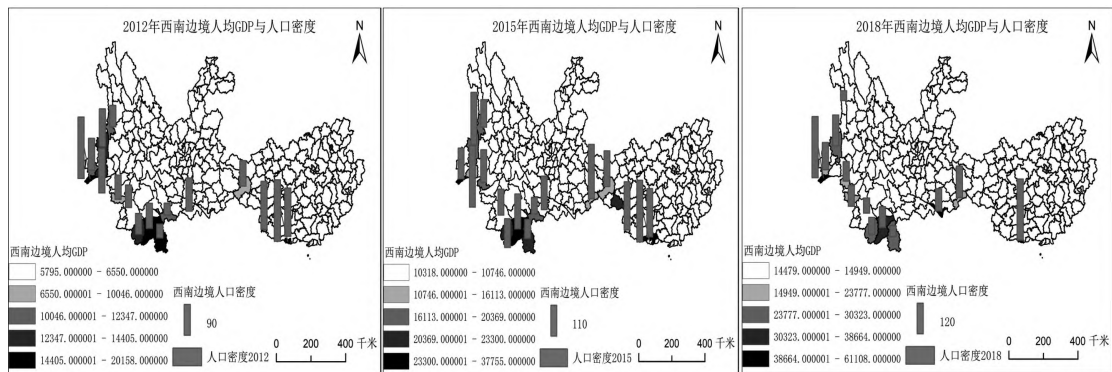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18 年西南边境人均 GDP 与人口密度变化情况

(注: 图 3 数据来源于 2012 年、2015 年、2018 年《云南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

量软件对 2012 年、2015 年、2018 年的 CMDS 中有居留意愿数据的西南边境县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可视化,用自然段点法将居留意愿按颜色从深到浅划分为 5 类^⑧: V 类、IV 类、III 类、II 类与 I 类分别对应高、较高、中等、较低与低等居留意愿,如图 2。同理,将这些边境县的人均 GDP 与人口密度按相应年份进行空间可视化,如图 3。

从时间维度来看,西南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下降,局地变化可以分为“虚空型”“稳定型”“波动型”“聚集型”四种类型(如表 3)。29 个边境县中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下降的有 19 个,上升或变化稳定的仅有 10 个。其中,有 9 个边境县直线下降了近 50%,属于“虚空化型”。有 7 个边境县变化在 10% 左右,可划为“稳定型”。其他变化幅度超过了 10%,划定为“波动型”(可细分为波动上升型、波动下降型),其中在波动中走向上升的有 3 个县,均在广西,在波动中走向下降的有 10 个县,前者的人均 GDP 增速高于后者。在这三种居留意愿类型的基础上,出现 3 个跨县聚集的片区:滇西聚集区、滇西南聚集区、桂南聚集区中的 12 个边境县,可划分为“聚集型”。

在居留意愿总体走低的环境下,“波动型”特别是“波动上升型”居留意愿(V 类、IV 类)为“逆虚空化”提供了政策线索。这一类型县(市)在西南边境中经济发展较好,均位于中越边境,拥有对外开放口岸,其中东兴市、凭祥市为国家级口岸。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沿边开放规

^⑧为将 2012—2018 年更好的进行比较,从科学性出发,以 2015 年的居留意愿比例为标准进行可视化。

表3 2012-2018年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类型划分

居留意愿类型	边境县
“虚空化型”（直线下降型）	靖西县、孟连县、沧源县、龙陵县、马关县、麻栗坡县、金平县、勐腊县、勐海县
波动上升型	防城区、凭祥市、东兴市
“波动型”	江城县、镇康县、腾冲县、富宁县、河口县、景洪市、瑞丽市、陇川县、泸水市、澜沧县
波动下降型	
“稳定型”	龙州县、耿马县、西盟县、芒市、绿春县、盈江县、福贡县
“聚集型”	滇西聚集区（腾冲县、瑞丽市、芒市、陇川县）——滇西南聚集区（景洪市、勐海县、勐海县、澜沧县、江城县）——桂南聚集区（防城区、东兴市、凭祥市）

划的实施,中缅、中越边境各个口岸蓬勃发展,经贸合作不断加强^[25]。宋周莺发现东兴、友谊关(凭祥市)2个沿边口岸的拉动作用较强,从口岸城市模式演变成枢纽口岸;而瑞丽、河口的口岸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有所下降^[26]。经济发展能提升就业率和收入,从而提升居留意愿。但2020年以来,越南、缅甸疫情反复,“外防输入”的防疫政策下西南边境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瑞丽、芒市、河口等城市流动人口大量外流。截至2021年12月21日,疫情以来瑞丽主城区离瑞人口约有142,529人,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⑨,其中大部分是流动人口,这从反面印证了经济发展、就业提升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3.2.3 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边境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高

部分学者认为边境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因为经济总量向大城市快速聚集,降低了边境地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社会发展层次^[27],此虹吸效应会逐级传递到边境基层。图4中GDP份额领先于常住人口份额的区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这部分群体主要分布在“波动上升型”中的广西边境县与“波动下降型”中的瑞丽市、景洪市、河口县。地区GDP份额远落后于常住人口份额的地区则情况相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为“虚空化型”,主要在靖西县、孟连县、沧源县、马关县、麻栗坡县、金平县等。由上可知,西南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暂时不符合“兴边强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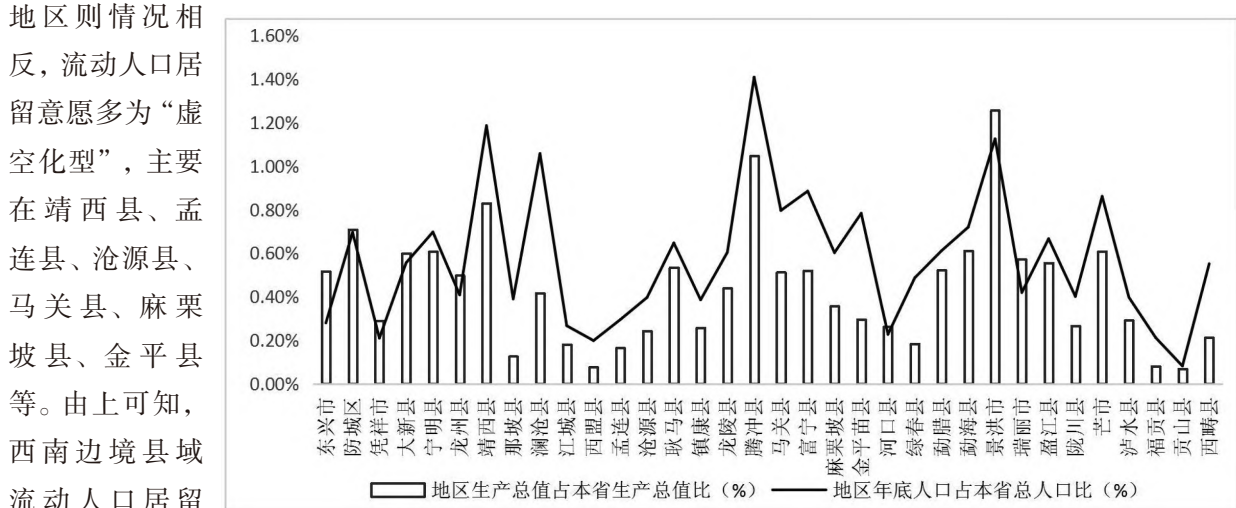


图4 2015年西南边境县GDP份额与常住人口份额

(注:图4数据来源于2015年《云南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

⑨数据来源于云南官方微博和公众号掌上瑞丽公布的数据。2021年4月13日瑞丽第三轮全员核酸381,163份,4月4日除主城区外各乡镇核检采样52,770份,由此可得主城区人数约在328,393人,2021年12月21日,瑞丽主城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185,864份。用328,393减去185,864可知主城区离瑞人口约为142,529人。

的政策预期,但符合经济规律。边疆在持续的治理政策资源投入之下,不少地方却出现了“空心化”问题,甚至加剧,说明经济规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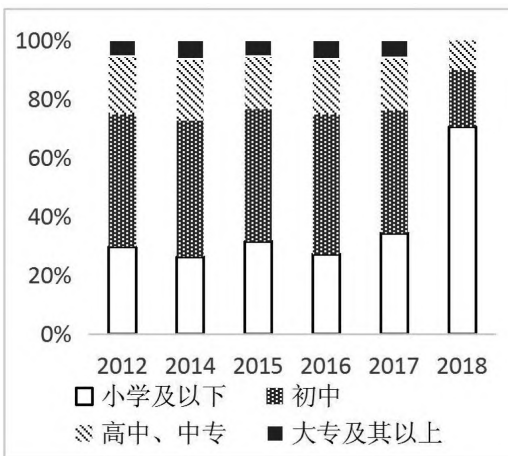


图 5: 各类受教育程度的居留意愿变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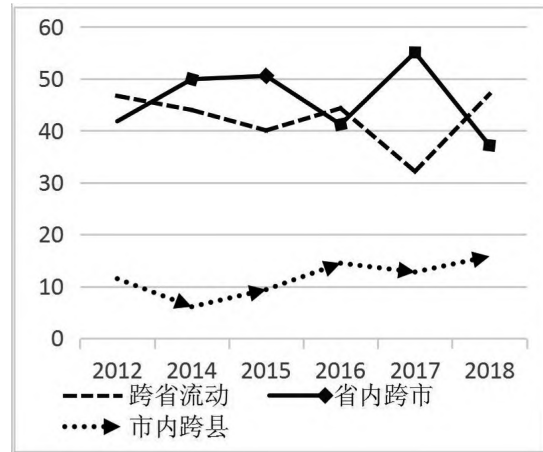


图 6: 迁入者不同流动范围的居留意愿变化 (%)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 2012—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于政策影响。这也为下一步精准调适政策,遵循经济规律和人口流动规律,有效吸引人口充实边疆提供了依据。

3.2.4 边境县域多吸引受教育程度低的流动人口

各类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差异性,变化趋势也呈现异质性。整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流入人口学历集中于初中及以下。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高,约占样本的 40—50% (2018 年除外),其次为小学及以下,高中及中专次之,大专及其以上的居留意愿最低。这是因为学历越高的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容易再次迁移。

从年度变化来看,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居留意愿逐年上升,而高中及中专(下降了近 10%)、大专及其以上(下降了 5.51%)的居留意愿呈下降趋势。优质人力资源减少将缺乏相互激发和助推的环境,容易产生负外部性。

3.2.5 迁入以省内跨市为主而迁出目的地“极化”明显

如图 6 所示,2012—2018 年样本中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占比最高的是省内跨市流动(37.19—55.08%),并且居留意愿较高(41.81—55.08%)。云南省内跨市流动中 66.8% 迁入了西双版纳州,13.51% 与 12.36% 分别迁入红河州和昆明市。广西区内跨市的流动人口中 80.49% 迁入了防城港市。愿意在迁入地长期居留的人口中有 37.22% 因为收入水平高、个人发展空间大,21.83% 是由于当地医疗、交通与教育条件,19.13% 因为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融合。占比第二的是跨省流动(32.15—47.02%),最少的是市内跨县流动(6.09—15.79%)。西南边境地区跨省迁出人口的目的地向东部“极化”现象突出,88.1% 流入了东部地区。这符合“不论是边境还是其他地区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的总格局依然没有改变”^[28]的判断。因此,要解决西南边境的“空心化”,要以沿边开放促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的方式吸引跨省与市内跨县流入人口的长期居留,同时也要强化已有较高居留意愿的省内跨市流入人口的获得感。

3.3 西南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历时比较

表 4 给出了按年份建立的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可用于检验相关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及其年份间差异。

3.3.1 个人社会特征作用方向不一但呈“乡迁城”“低文化”“家庭型”特征

在个人社会特征中,户口性质的作用仅在2016—2018年这三轮调查数据显著为正,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西南边境县居留,这与朱宇对全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曹广忠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结果有差异。受教育程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也异于内陆,迁入人口受教育

表4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

	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u>个人社会特征</u>						
性别(男)女	0.021	0.24	-0.103	0.139	-0.032	-0.267
年龄(15—25岁)26—35岁	0.107	-0.251	-0.458**	0.26	0.245	-0.262
36—45岁	0.002	0.136	-0.535**	0.023	0.393	-0.039
46—55岁	-0.34	-0.311	-0.564**	-0.172	0.527*	-0.139
55岁以上	1.207	-0.237	0.283	0.193	-0.437	0.027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	-0.095	-0.136	-0.335*	-0.132	0.02	0.087
高中及中专	0.362	0.171	-0.325	-0.163	0.118	0.116
大专及以上学历	-0.117	0.206	-0.259	0.263	0.092	—
户口性质(非农户口)农业户口	0.174	-0.026	-0.067	0.428**	0.895***	0.420*
配偶情况(有)无	-0.410*	-0.084	-0.505**	-0.358*	0.037	-0.298
<u>流动特征</u>						
流动范围(跨省流动)省内跨市	0.477**	0.478**	0.438***	0.16	0.887***	0.467**
市内跨县	0.765**	-0.329	0.083	0.248	0.511**	0.918***
流入时间(1年以下)1—3年	0.413	0.548	0.676**	0.983**	0.852**	0.527
4—6年	1.094***	1.144***	1.231***	1.809***	1.282***	1.090**
7—9年	1.467***	1.168**	1.362***	1.772***	1.621***	1.538***
10年及以上	1.767***	1.671***	1.773***	2.240***	2.225***	1.666***
<u>经济融合</u>						
家庭平均月收入(元)(3000以下)3001—6000	0.506**	0.609**	-0.212	0.377*	-0.490**	0.311
6001—9000	0.42	0.605**	-0.522**	0.613**	-0.307	0.503*
9001元以上	1.744***	1.289***	0.254	0.811***	-0.265	0.729**
主要职业(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0.235	-0.724**	0.146	-0.708	0.539	-0.062
农业及产业工人	0.699*	0.174	0.45	-0.257	0.576	-0.697
其他	-0.251	-0.799	0.552	-0.628	0.842**	-0.115
住房性质(租房)自有住房	0.997***	1.797***	—	1.610***	1.110***	—
低租金或免费住房	0.450**	0.588**	—	0.772***	0.198	—
就业身份(雇员)雇主	-0.844***	1.426***	0.358**	0.716***	0.257	0.177
自营者	0.254	0.614***	-0.213	0.493**	-0.092	0.045
常数项	-1.435**	-1.787**	-0.305	-2.456***	-3.130***	-1.836**
观测数	865	854	1,138	1,068	1,225	840
Pseudo R ²	0.1518	0.1812	0.0927	0.1816	0.1707	0.0835

注:***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 由于篇幅原因将括号中的标准误与

Odds Ratio 省略。

程度较低,以小学初中为主,在各年中均占70%及以上。在2012年、2015年、2016年中没有配偶对居留意愿呈显著负向作用,单身流动人口因为没有家人羁绊,更容易发生再次迁移。性别、年龄的影响作用并不稳定,仅2015年呈现出典型的“长者低居留意愿”。

3.3.2 本地居留时长相较于流动范围具有更稳定的正向影响

相对于流动范围,在本地居留时长,特别是居住4年及以上对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稳定的正向作用,且影响系数更大。居住时间越长,环境适应能力越强,在当地的社会网络越紧密,

社会资本越丰厚,生存发展更为容易。流动范围中仅省内跨市在绝大多数年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市内跨县在2012年、2017年与2018年中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系数均小于本地居留时长。结合上文(图2、图6)来看,我国西南边境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情况,主要为省内流动,其次为跨省流动,而跨省流入的户籍来源地大部分来自于西部地区。省内流动是选择熟悉的自然、文化环境的短距离迁移,是基于对迁移成本和发展机会的综合考量。

3.3.3 住房与收入相对于从业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

相较于家庭平均月收入、就业身份和职业,住房性质在各年间对居留意愿始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流入地拥有自己住房者的居留意愿在各年中均为最强烈(OR=2.71、6.03、5.004、3.05),即使是低租金或免费住房的群体,其居留意愿也比租房者平均高1.2倍。由于传统文化“居者有其屋”的影响,加之住房、租房开支所费不菲,所以住房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因而,可以通过加大流入人口的购房政策优惠与补贴,吸引其购房,进而提高其居留意愿。

家庭平均月收入在大多数年份对居留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西南边境县的流入人口60%以上都是出于经商与务工/工作需要,迁入后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有能力支付居留成本,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增强了居留意愿。同理,就业身份方面,雇主相对于雇员与自营者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具有正向作用。雇主不仅意味着地位、收入,也意味着是当地场域中的“成功者”,这显然与边境县域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相契合。主要职业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且作用方向总体上并不一致。样本中大多是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主要包括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等人员),不同年份占比在47.24-57.81%之间,其中经商占比最高,占40%左右。

3.3.4 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从整体上看,在控制了个人社会特征与流动特征后,社会融合中的热爱流入地、主动融入、本地人接纳、身份认同变量对西南边境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以往马忠才(2019)、郭未(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2012到2017年的伪决定系数Pseudo R²逐渐增大,模型的解释力逐渐增强。具体来看,2012年热爱流入地者的居留意愿发生比率是不热爱者的14.38倍。从愿意主动融入这个变量来看,2012年、2017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愿意主动融入者的居留意愿发生比率是不愿意者的2.14倍与2.43倍。身份认同

表5 社会融合与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

变量	2012		2017	
	B	Odds	B	Odds
个人社会特征	✓	✓	✓	✓
流动特征	✓	✓	✓	✓
热爱流入地(否)是	2.666*** (3.11)	14.37646	-0.830* (-1.95)	0.4358332
关注流入地(否)是	-1.508** (-2.30)	0.2213376	-0.378 (-1.34)	0.6850324
愿意主动融入(否)是	0.761* (1.88)	2.140422	0.892*** (2.95)	2.43995
本地人接纳(否)是	0.553*** (2.81)	1.73854	0.212 (1.32)	1.236118
身份认同(否)是	0.853*** (5.42)	2.345642	0.788*** (4.23)	2.198304
常数项	-2.845*** (-3.28)	0.0581594	-2.367*** (-3.83)	0.0937231
R ²	0.1294	—	0.1477	—
观测数	974		1,435	

注:***p<0.01,**p<0.05,*p<0.1,括号内为标准误,问卷在各年间关于社会融合变量的调查不全,因此仅选择比较全面的2012与2017年进行回归分析。

对个体居留意愿的影响始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人接纳的影响作用并不稳定,2012年显著为正,但2017年不显著。

西南边境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样本所在的29个边境县多数是集边疆、民族、宗教、贫困、高山峡谷等特征于一身的县份,因此,该区域的流动人口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问题。具体来看,西南边境流动人口中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哈尼族占比最高(25.02%—29.03%)、彝族(17.5%—24.88%)次之,之后是壮族与苗族(10%—20%),白族、傣族、蒙古族、布依族、侗族、黎族以及瑶族等占比较低。理论上,文化习俗异质性增加了劳动力分割与社会融入难度,但是随着边疆民族地区年轻群体中普通话、义务教育的普及,语言阻隔的影响已经减弱,所以尽管西南边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元,但对其居留意愿没有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文章利用近十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和云南、广西两省区统计年鉴,对我国西南边境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布变化进行描述、特征分类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空间分布看,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走低,与内地出现“剪刀差”现象,而局部的居留意愿可分“虚空化型”“稳定性”“波动型”“聚集型”4种。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西南边境县,其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高。持续的政策投入下产生的“空心化”问题,提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方可提升政策绩效。边境地区多吸引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需防范“人力资源负外部性”风险。从流动范围来看,迁入西南边境地区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而迁出以向东部跨省为主,目的地“极化”明显。从影响因素来看,个人社会特征对西南边境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作用方向不一致,“乡迁城”“低文化”“家庭型”的特征明显。经济融合变量中本地居留时长相较于流动范围,住房与收入相对于从业对居留意愿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中的热爱流入地、主动融入、本地人接纳、身份认同变量对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结论的政策寓意在于:“经济人”“社会人”属性共同影响了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逆虚空化”政策调适需要遵循规律,推动西南边境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来提升居留意愿,具体建议如下:

4.1 发展边贸和边境特色旅游吸引边境流动人口就业增收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流动人口又受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收的影响。西南边境县域大部分显露“虚空化”端倪,局地出现“逆虚空化”势头,而且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边境县的流动人口拥有较高居留意愿,这些现象说明了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是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力。正所谓人口流动是普遍规律在起作用,西南边境的独特性也是在普遍规律下开出的花朵。

因此,产业兴边不能简单地向西南边境倾注资源、项目,而要精准定策施策。边境地区劳动生产率低、产业配套差、局地存在边境冲突风险,如果一味地“用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本地工业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发展,可能会得不偿失”^[29]。因此边境地区适合发挥相对优势,发展边贸和边境特色旅游,吸引边境流动人口就业增收,为其长期居留打下经济基础。为实现这一目的,边境地区一方面需要改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构建广西、云南周边省区及内陆腹地经边境延伸至南亚东南亚的综合运输通道,形成边境地区内畅外通、运行高效的综合

交通网,推进智慧口岸、边境智慧城市、智慧安防建设。另一方面,边境地区需要加快营商环境综合建设,积极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完善边境贸易政策,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西南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重点城市在投资贸易、文化科技、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合作机制,为边境地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就业与收入,为人口集聚搭建平台。

4.2 提升开放亲善型公共服务促进边境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的迁移是为了追求生计改善与发展空间而进行的“混合扫描”决策,而公共服务改进能降低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成本,提升其经济与社会融合,因此可通过完善开放亲善型公共服务,增强边境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他们的居留决策。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边境基层政府可探索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普通话培训,提升其生存发展技能;可以为中长期居留者拓展保障房,增加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资源供给,减轻住房压力;在边境地区探索家庭亲厚型落户政策,为随迁父母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转接服务,为随迁子女提供便捷的义务教育接续服务,促进“家庭型”居留决策。此外,边境基层政府还可以探索搭建各族人民节庆民俗文旅平台,长期开展喜闻乐见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机会和空间,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高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在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提升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4.3 以边境城镇化稳定边境流动人口的居留态势

城镇对包括人力在内的各类资源有集聚和稳定作用,边境地方政府可集中选取、培育、打造西南边境一线重点城镇,强化边境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一是要建立人口流动监测机制,把数据纳入培育发展重点城镇的观测指标;二是对确立的重点城镇要给予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三是对已确定的重点城镇要搞好规划布局,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立足长远,实行多规合一,为产业和人口集聚提供必要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 白利友,谭立力.基于全球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的中国西南边境虚空化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15.
- [2] 阳茂庆.中国西南边境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6:127-159.
- [3] 赵如婧,周皓,彭成琛妮.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研究——基于2010-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人口与发展,2021(6):22-35.
- [4] 杨东亮.东北流出流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比较研究[J].人口学刊,2016(5):34-44.
- [5] 张丽君,王玉芬.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边境贸易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186.
- [6]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中国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一览表[EB/OL].http://www.gov.cn/test/2006-07/14/content_335831.htm,(中央政府对陆地边境的划分明细).2006.7.14.
- [7]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文献综述及其启示[J].人口与经济,2019(2):17-27.
- [8] FAN C Cindy.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J].The China Review, 2011, 11(2):11-42.
- [9] 齐嘉楠.空间、规模与结构:城镇化背景下农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变动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8(5):29-39.

- [10] 林李月, 朱宇.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地理学报, 2016(10):1696-1709.
- [11] 赵如婧, 周皓, 彭成琛妮.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研究——基于2010-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人口与发展, 2021(6):22-35.
- [12] Stark O, Levhari D. On migration and risk in LDCs.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1982, 31(1):191-196.
- [13] Herberle R. The causes of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 *Journal of sociology* [J], 1938, 43.
- [14] 吴琼, 蔡果兰. 云南省边境县流动人口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27(02):90-96.
- [15] 尹佳玉, 蔡果兰. 东北边境县流入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2):82-87.
- [16] ZHU Y, CHEN W Z.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 [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4):253-267.
- [17] CAO G, LI M, MA Y, et al. Self-employment and intention of permanent urban settlem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China's four major urbanising areas [J]. *Urban Studies*, 2015, 52(4):639-664.
- [18] 王晓峰, 田步伟.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5(3):82-87.
- [19] 罗红霞, 葛智伟. 特征、因果与对策: 边民居留稳定性的调查与思考[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3):21-29.
- [20] 王朋岗. 社会融合视角下新疆跨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新疆、北京和广东的比较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5(2): 66-71.
- [21]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中国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一览表 http://www.gov.cn/test/2006-07/14/content_335831.htm, 2006.7.14. 引用时间 2022.3.6.
- [22] 李琴, 谢治. 青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居留意愿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9):27-35.
- [23] 崔佳伟, 周伟, 钱庆等.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9, 28(5):20-28.
- [24] 万向东, 孙中伟.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171-181.
- [25] 付永丽. 中缅边境陆路口岸的特点及发展策略[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2):62-69.
- [26] 宋周莺, 车姝韵, 王姣娥等. 中国沿边口岸的时空格局及功能模式[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5):589-597.
- [27] 杨明洪, 王周博. 我国陆地边境地区“空心化”的类型、成因与治理[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13-24.
- [28] 樊士德, 金童谣. “七普”数据昭示的我国人口流动新趋势 [EB/OL].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02468. 2021-06-01, 引用时间: 2021.12.10.
- [29] 陆铭. 大国大城: 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7.

(下转第51页)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In addi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come is higher than the employed income; 2.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variable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region all affect the income of returned rural labors. The three dimensional indexe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verage, depth of use and degree of digital support) can 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eturned labors and the coverag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variable ; 3.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rings about more significant income promotion of the returned labors from the developed first-line metropolises, new first-line metropolises and second-line cities in the eastern, southern, central and southwest China; 4.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affect the income of return labors through their local financ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ability, social network and career choic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levant policy support for how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returned labors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in the rural region.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eturned rural labors, Income growth, Spatial difference



(上接第 36 页)

Trend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Dwelling Will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in Southwest Border Counties Based the Data of 2012–2018 CMDS

LUO Hong-xia, ZHU Xing-yu²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Abstract: Based on CMDS 2012–2018 and yearbook, the paper adopt the method of Arcgis visualization and Stata regression to estimate the trend and the motiv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dwelling willing in southwest border count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dwelling willing is generally low with a trend of scissors difference comparing with that of the inland. The counties in southwest border can be divided into 4 categories in terms of dwelling willing, i.e. emigration, stable in dwelling, fluctuation of dwelling, and population aggregation, generally, the counties with higher economic aggregation tha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have more dwelling willing. The border counties mostly attract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 from intra province while the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 of the local counties tend to migrate toward the eastern provinc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ver time show a inconsistent direction with the individu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welling willing is mostly motivated by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low education, and family with relatively stabl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variables. It implicates that the dwelling willing are determined by the attributes of economic man and social man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have more favorable police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counties.

Keywords: Southwest border, Floating population intra county, Dwelling willing, Influencing factors, Diachronic changes